

试析以色列新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的国际因素

周 承*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将近百万俄裔犹太人推向历史祖国的怀抱,最终形成了以色列最大的移民群体——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在其形成过程中,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的某些国际因素——苏联、以色列和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对策,对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

【关键词】 以色列 俄裔犹太移民 国际因素

【中图分类号】 K382.5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3—0075—(07)

一、引言

2006年10月,俄裔犹太移民^②政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受邀联合执政,党魁阿维格多·利伯曼担任副总理兼战略事务部部长,并进入以色列核心安全内阁。利伯曼的再度入阁,不仅展现了其个人的政治影响,更是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新的标志。利伯曼成为纳坦·夏兰斯基之后又一位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俄裔犹太移民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俄裔犹太移民的政治能量再度震动着以色列政坛。

以色列从建国至今,先后接纳了116万多的俄裔犹太移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移民浪潮,使112万5千多俄裔犹太人涌向以色列。^[1]目前,仍有70多万俄裔犹太移民定居在以色列,占据以色列人口的1/10。俄裔犹太移民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民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建国和发展进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著名活动中,有相当多的俄裔犹太移民。比如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魏茨曼、伊扎克·本-茨维、扎勒曼·夏扎尔,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列维·艾希科尔、梅厄夫人、梅纳赫姆·贝京、西蒙·佩雷斯,第一任议长约瑟夫·斯普林扎克等等。另外,俄裔犹太移民的后裔也在以色列政坛上叱咤风云,代表人物如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阿里埃勒·沙龙和现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等。而20世纪70年代后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经过30多年的适应和发展,逐渐融入以色列犹

* 周承,1967年4月生,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② 自公元前2—1世纪,犹太人就已经出现在现俄罗斯土地上。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发展,至18世纪沙皇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后,寄居在沙皇俄国本土及附属国的犹太人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被称为俄罗斯犹太人。苏联时期又被称为苏联犹太人。后随着苏联解体,他们散居在俄罗斯联邦等独联体各国,被称为前苏联犹太人、操俄语的犹太人、俄罗斯的犹太人、独联体的犹太人等等不一。考察历史发展,结合各种称谓,本文提出“俄裔犹太人”这一概念,泛指各个时期寄居在沙皇俄国及其附属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国家的犹太人。而“俄裔犹太移民”则泛指各个时期移居到世界各地的原寄居在沙皇俄国及其附属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国家的犹太人。

太社会,宣告了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群体的诞生。一些移民领袖积极投入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逐渐崭露头角。^① 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充分发挥手中选票的作用,维护自身利益,牵制着当今以色列政坛的构成。在1992年、1996年、1999年、2001年、2003年、2006年的选举中,凡是能够上台执政的政党都离不开俄裔犹太移民的支持。同样,失去俄裔犹太移民的支持,就意味着离开政权核心。

随着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已经成为制约以色列内政外交的重要力量,也成为牵动巴以和平进程走向和中东局势发展的重要变数。利伯曼入阁之所以引起巴以双方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在于作为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政治利益代表的利伯曼和“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在以色列内政外交上所持的鹰派立场,使得人们对以色列政府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达成统一认识深表担忧,中东和平进程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应该是中东问题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对象。而在探析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内政外交和对巴以关系的影响之前,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冷战后期,同当时的国际关系发展态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下深刻的烙印。而其中,苏联、以色列和美国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对策,对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推动。本文试图通过对俄裔犹太人移民运动的有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初步勾勒对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苏联、以色列、美国的历史作用,以此为中东问题研究提供新的例证。

二、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俄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阿里亚”^②始于19世纪后期。之后从20世纪初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联的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因受苏联政策限制,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浪潮已渐趋式微。在这近60年中,俄裔犹太移民大多是随着阿里亚或受到以色列建国的召唤来到巴勒斯坦,构成了老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群体。他们在寄居国深受反犹太主义的迫害,为寻求生存,积极投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通过移民的方式为犹太国家的复兴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老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已经完全融入了以色列社会,成为以色列移民的开拓者和国家建设的先驱者。

20世纪50—60年代,受冷战和美苏对中东利益争夺的影响,俄裔犹太移民活动走向停滞。据资料显示,1948年—1966年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总共发出入境签证只有5,772张。1967年—1970年,每年获准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分别为1,162、223、2,979、1,027名。^[1]

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渐趋缓和。1973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苏联开始放松对俄裔犹太人离境的限制。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活动在沉寂了20多年后陡然加剧。1971年—1980年,有246,267名俄裔犹太人获准离境,其中155,218人到达以色列。^[1]而在80年代中,每年均有数万人被允许出境。由此,新一轮俄裔犹太人移民浪潮拉开序幕,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逐渐形成。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进一步缓和与美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变了长期执行的限制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政策。1989年,在172万俄裔犹太人,约有100万人提出申请,要求移居以色列。^{[2](p22)}

苏联解体后,俄裔犹太人可以较为自由地移居国外。至今,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有超过100万的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发生的跨国人口大流动,对以色列、俄罗斯,乃至对中东地区具有深远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老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相比,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的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背景

① 代表人物包括纳坦·夏兰斯基、阿维格多尔·利伯曼、尤里·爱德尔斯坦、塔基亚娜·爱德尔斯坦、尤里·科沙洛夫斯基、泽艾夫·盖泽尔、平哈斯·波隆斯基、鲍里斯·杰维亚托夫、埃杜阿尔德·库茨涅佐夫、拉莉萨·格尔斯坦、尤里·施特伦、别察列尔·西夫、米哈伊尔·索洛特金等等。夏兰斯基、利伯曼、爱德尔斯坦、施特伦等都在以色列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② 指散居在世界各地或流亡海外的犹太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移居巴勒斯坦的浪潮。

下苏联、以色列、美国台前幕后的作用,成为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的苏联因素

冷战爆发后,因由于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接近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提高,以苏关系逐步交恶。苏联为维护其中东利益,对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内限制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冷战后期,因受阿富汗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牵制,苏联国力衰退,各类社会矛盾逐渐浮现、激化。为摆脱内忧外患,苏联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迎合西方阵营的要求,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保证国家根本利益不受损害。俄裔犹太人移民政策的解禁,成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象征之一。大批俄裔犹太人适时脱离异常艰难的境遇奔赴历史祖国,形成了以色列新的移民群体。

1. 冷战思维与反犹浪潮催化了俄裔犹太人回归故土的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兴起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而原本具有“社会主义因素”^①的以色列,并未因苏联对其建国的帮助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投向美国,成为西方阵营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于是,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裔犹太人就被苏联看成潜在的威胁因素。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对俄裔犹太人的不信任感始终非常强烈。俄裔犹太人同时面对着传统的社会排斥和现时的政治歧视。犹太文化和风俗受到限制,犹太剧院、犹太报纸、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纷纷被取缔,犹太复国主义被绝对禁止。斯大林晚年的“医生谋杀案”和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犯罪控告”运动,在苏联社会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反犹排犹浪潮,导致大批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被处死或被监禁。1948年—1953年,俄裔犹太人减少到300万。苏联的民族政策从未明确犹太人的民族地位,要求犹太人积极融合到具有全民共同特性的“苏联人”的形成过程中。采取的同化政策使得大部分俄裔犹太人已经适应了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凡此种种,导致俄裔犹太人政治人格不被信任、文化习俗不被尊重、民族身份不被承认。在整个社会中,犹太人的地位是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

为彻底隔绝俄裔犹太人与外界特别是以色列的联系,也为遏制人才流失,苏联实施了严厉的移民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对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进行控制,诸如设置复杂繁琐的申请程序、对不同的申请者区别对待、对移民施加经济压力征收“教育税”、通过降级解职或剥夺公民权等手段。^[3](p654—657)俄裔犹太人成为东西方冷战和苏联反犹浪潮的牺牲品。

但政治压制、文化同化、移民限制并没有驱散俄裔犹太人回归历史故土的情结,其潜伏在内心的对历史祖国的向往和对同化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强,犹太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他们以宗教习俗和语言学习^②为载体作着默默的文化抗争,保持着对犹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亲近。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和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以少打多,不仅击退了阿拉伯国家军队的攻击,而且夺得了对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区的控制权。历史祖国的生存保卫战取得巨大成功,也进一步催生了俄裔犹太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争相奔赴以色列。据统计,1973年有33,600名犹太人奔赴以色列,其中11,025名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移居的。^[4](p355)到1975年,约有11万4千多人离开苏联,其中10万多人迁入以色列。^[5](p71)

由于俄罗斯民众社会观念中的反犹倾向阴魂不散,再加上苏联解体前后一蹶不振的经济状况和复杂的民族矛盾,俄裔犹太人试图借助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和优惠条件为个人的发展寻找空间,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一旦政策解禁、时机成熟,俄裔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就将超常迸发。许多俄裔犹太人在

① 20世纪20年代后,苏联、东欧国家的犹太移民按照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巴勒斯坦荒地上建立起基布兹,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共同劳动,一切归公,按需分配。斯大林认为,以色列主要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侨民,同苏联集体农庄有相似之处的基布兹将像犹太移民居民点一样成为中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这也是促成斯大林决定承认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因素”。

② 意第绪语或称依地语(Yiddish),就是俄裔犹太人坚持使用的民族语言。在德语中混入斯拉夫语、希伯来语,以希伯来文书写,由寄居在英、美、俄及东欧等地区的犹太人使用。

受到以色列亲朋好友的召唤后,立即踏上旅程,急切回归历史祖国,实现家庭或家族的团聚。

2. 政策解禁和苏联解体消除了俄裔犹太人回归故土的障碍。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为争取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和更多贷款,不得不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放宽了移民限制,允许每年有一定数量的俄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时表示,苏联将每年允许3万6千到4万犹太人移民以色列。1974年6月,又将数量提升到每年5万人。^{[6](p541)}虽然不久后美国提出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但苏联为表示缓和“诚意”,展现其公民的人权与自由,仍然大量放行俄裔犹太人离境移民,只是人数有所降低。1975年获准离境的人数为13,221名,定居以色列的人数为8,293名。1976年分别为14,261人和7,258人,1977年分别为16,736人和8,253人。^[1]但苏联的努力并没有阻止《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正式实施。苏联为报复美国,再次限制俄裔犹太人移民。从1981—1987年,获准离境的俄裔犹太人迅速减少为24,555人。^[1]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对俄裔犹太人进一步实施宽容政策,取消对犹太教活动的种种限制。比如,同意兴建犹太教堂,正式开放了犹太人文化中心,不再禁止教授希伯来语,准许进口希伯来语宗教教科书,批准俄裔犹太人出国接受犹太法学博士的培训,同意苏以两国犹太教士互访,允许俄裔犹太人和以色列公民相互探亲访友,允许在莫斯科开办按犹太教规烹制食品的饭店。与此同时,大幅度放宽对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还规定审理俄裔犹太人出境事宜在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则3天内就予以办妥。正是由于当时苏联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成千上万的俄裔犹太人得以争先恐后地涌入以色列。应该承认,没有苏联政府的允许,俄裔犹太人的移民难以成行。因此,苏联在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苏联的这种举动并非积极主动的政策行为,而是将犹太移民问题视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处理双方关系上的一个筹码,将以色列视为接近美国市场和获得大量美国财政援助、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铺路石,借助犹太人院外集团向美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取消对苏的种种贸易限制。苏联曾一再发出警告:一旦苏以关系恶化,将极有可能改变对俄裔犹太人的政策。所以,俄裔犹太移民问题成为苏联在冷战时期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制,以牺牲局部利益来实现国家根本利益的手段。

苏联解体后,俄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政策障碍已被消除。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与以色列的关系全面恢复。移民政策基本摆脱了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制约,俄裔犹太人移居国外更加自由。俄裔犹太人又成为东西方冷战和苏联解体的受益者。最终,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浪潮席卷全国,形成了壮观的百万俄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人口大流动。而以以色列为保障犹太国家的生存,促进犹太民族的发展,以极其高昂的热情和主动的姿态,接纳和安置了“俄罗斯化”的同胞。

四、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的以色列因素

以色列处于阿拉伯国家包围圈中,如同犹太人的孤岛,始终面临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较少的生存危机。冷战时期,由苏联支撑的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始终让以色列感觉如芒在背。除了紧紧投靠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战略安全保护伞外,本国犹太民族的人口问题是保证犹太国家能否生存和延续的关键因素。否则,犹太国家及其领土、主权和文化等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都无从谈起。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仅我们的安全——那是我们生存的条件——而且我们的建设和进步都取决于我们吸收的移民的增加”,“二百万人民不能长期应付建设国家、发展教育和科学、求得经济独立、保证我国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困难任务”。^{[7](p144)}因此,千方百计地广泛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来以色列定居,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政府恪守不变的基本国策。

1. 制定政策吸引移民。以色列从建国伊始就公开宣示,鼓励世界各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1948年的《独立宣言》明确提出,“以色列国将准予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移居入境”,“我们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移入和发展的工作中团结到我们这边来,并且实现世代以来的梦想,为以色列的复兴而进行的伟大的斗争中和我们站在一起”。^{[7](p136-138)}1950年,以色列议会一致通过了《回归法》,明确规定“每一位犹太人都作为移民回到以色列”。1970年又对《回归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放宽了移民条件。1952年通过的《国籍法》规定,只要入境的犹太人愿意加入以色列国籍,在入境的同时自动成为以色列人。以色列

国籍法适用于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或居民,以及愿意定居该国的人。《回归法》和《国籍法》相辅相成,从法律上赋予世界各地犹太人可自由移居以色列并永久居住的权利。^{[8](p130)}

苏联的移民限制政策并未妨碍以色列政府吸纳俄裔犹太移民,反将从苏联等东欧国家吸收犹太移民列为重中之重。本—古里安 1959 年 2 月 10 日在犹太工人总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所发生的重要事实是从东欧国家的移民增加了……我们不仅可以希望来几千人而且可以希望来的人数几十倍于此……接纳、吸收这些移民,为他们安排住宅,是他们参加到工作中、参加到以色列经济和希伯来文化中去,是目前的首要任务……。”^{[7](p144)}沙米尔将吸引犹太人视作“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质”,提出要建立“大以色列”来接纳来自苏联的大批俄裔犹太移民。他说:“为了这么大批的移民,我们需要以色列国土和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家”,而这些俄裔犹太移民将使以色列变的“更大、更好、更强”。^[9]

2. 采取措施保障移民。以色列政府为犹太移民定居制订了优厚、完备的措施。政府和议会设有专门的移民安置机构,负责协调犹太移民的吸纳和安置工作,并在全以色列设立特别的住房、就业、文化等服务部门,与各种社会组织达成协议为移民提供帮助,与其他部门和公共组织一起为移民推出特殊计划。移民的移居手续、费用全部由移民机构负责,并可领取约 3 万美元的住房安家费及生活补贴,就业培训、希伯来语学习等都免费,专家学者移民还有特殊补贴。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移民的住房问题。时任以色列住房部长的沙龙曾公开宣布,要在 18 个月内准备好接待 100 万俄裔犹太移民,每月将修建 7,000 幢住房。^[10]以色列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和良好的物质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吸引俄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按照当时规定,申请移民的俄裔犹太人必须首先向苏联移民机构递交其以色列亲属的邀请信。以色列积极鼓励已定居者向俄裔犹太人发出邀请,促成俄裔犹太人尽快移民,仅 1989 年就有 198,000 名俄裔犹太人接到了邀请信。而在 1990 年头两个月,邀请的数字陡然增加了三倍。同时,以色列派出移民使团去苏联商讨相关事宜,加大邀请俄裔犹太人到以色列访问旅游的力度。在 1989 年 7 月就有 3,000 名犹太旅游者从苏联来到以色列。到 1989 年底,已有 25,000 人访问以色列。^[11]以色列还同苏联谈判,在以苏直航开通之前,分别开辟了在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空运中继站,方便俄裔犹太移民进入以色列。1990 年 10 月,莫斯科与特拉维夫直接通航。以色列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进一步激发了俄裔犹太人的移民热情。

以色列为吸引俄裔犹太人有时甚至不择手段。据以色列著名记者以色列·沙米尔在《话语的主人——美以恐怖主义》一书中透露,为吸引俄裔犹太人,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曾策划过代号为“KK Mountain”的系列间谍行动。他们散播谣言,妄称苏联境内将发生大规模的针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种族清洗,引起俄裔犹太人的极度恐慌。这不仅成功地使俄裔犹太人远走异国他乡,而且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苏联社会内部的分裂。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更加强烈,犹太人也更加恐慌,移民活动持续不断。

俄裔犹太移民浪潮对苏联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完全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只要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紧迫心理也就愈加强烈;只要国内局势越是动荡,苏联就越难顾及中东地区;只要与苏联的关系逐渐疏远,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必将减弱。但以色列无法单独完成吸引和安置俄裔犹太移民这个庞大工程,需要借助其保护人和代言人——美国的支持和帮助。

五、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的美国因素

在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美国犹太人的身影隐约可见。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深受越战牵制,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崛起和西方阵营的内部不和,美国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形象大打折扣,其在全球的霸权,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受到苏联的强大制约,在冷战中处于守势。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必须采取以点击面的战略,寻求突破,摆脱被动局面。而俄裔犹太移民问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美国积极支持以色列吸引和安置俄裔犹太人,既可以支撑其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以色列的战略优势,又可削弱其战略竞争对手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同时,以反对侵

犯公民人权、自由为幌子,借助俄裔犹太人问题造成苏联国内局势动荡,从而起到牵制作用。

1. 压制苏联放宽移民政策。从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就开始染指俄裔犹太移民问题。美国胁迫苏联改变移民限制政策的最重要举动,就是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以法律形式将贸易优惠与移民政策挂钩,企图迫使苏联就范。1973年和1974年,美国众议员瓦尼克和参议员杰克逊分别向国会提出贸易法修正案,规定“在苏联允许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自由移居国外之前,禁止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关税待遇和得到美国政府的贷款”,要求苏联“为不幸的移民打开大门,以每年至少准许6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作为取得最惠国待遇地位的交流条件”。

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总统也极力推动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活动。福特总统在其上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明确宣示,将于苏联人在它们不开明的移民政策上对抗。其间于1975年8月签订的《赫尔辛基最后条约》对促使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条约签署后,申请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数量急剧增长。卡特总统进一步推动了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将“人权”问题与移民问题挂钩,表达了对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关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施压更为密集。虽然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竭力与西方国家构建和睦关系,但美国非常清楚,苏联此时已是内外交困。里根总统明确表示,绝不会为了与苏联的友谊而牺牲俄裔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12](p131)}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一批被苏联打入监狱的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如夏兰斯基等得以移居以色列。老布什总统在推动苏以直航上也是不遗余力。他在接见夏兰斯基时亲口承诺将极力促成此事。^{[12](p72)}

2. 提供经济资助安置移民。为避免过分刺激苏联,也为平衡与阿以双方的关系,美国对以色列接纳俄裔犹太移民的支持,主要通过美国犹太人组织对以色列给予经济资助。以色列曾拟定了一份吸收俄裔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①得到了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支持。美国犹太人联合呼吁组织发起“自由迁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资金,以便安置俄裔犹太移民。1989年,该运动负责人马尔文兰德宣布准备集资7,500万美元,分配给海外和本土两部分移民。其中海外部分的50%,即全部收入的25%分配给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个人也纷纷捐款资助。比如,当时住在纽约的已年愈86岁的犹太人约瑟夫·格鲁斯决定帮助俄裔犹太人从美国流向以色列。为此,他捐出2,000万美元为愿去以色列定居的俄裔犹太人提供补充抵押款。1990年,美国犹太组织又决定在3年中募捐6亿多美元,用于吸引和安置俄裔犹太移民。^[11]

虽然美国为了不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和保持与巴解组织的对话,故作姿态地表示反对在被占领土扩大定居点和大量安置新移民,并提出了有条件的援助计划,但仍然决定提供4亿美元贷款,用于安置俄裔犹太移民。美国还在1990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否决了一些国家提出的禁止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安置新移民的提案。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与以色列寻求美国的帮助是相辅相成的。曾任以色列驻美大使和以色列犹太事务局主席的西姆哈·迪尼茨在与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会谈时,呼吁美国援助和鼓励俄裔犹太移民流向以色列而不是去美国定居。他认为,吸引和安置俄裔犹太移民,符合美国 and 以色列的共同利益。迪尼茨要求美国继续加强对以色列的经济支持;鼓励俄裔犹太移民持以色列护照,在离开苏联后直接奔赴以色列;对苏联施加压力,要它允许以色列外交官在莫斯科直接向犹太人提供去以色列的护照,允许俄裔犹太移民从苏联直飞以色列。以色列犹太事务局负责人还专门赴纽约同美国犹太人联合呼吁组织负责人进行会谈,要求将该组织的全部募捐交给以色列。以色列财长曾对来访的该组织使团提出,在帮助以色列吸收俄裔犹太人的同时,帮助在苏联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使一些知名的俄裔犹太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移民以色列。^[11]

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能够放手先后接纳超过100万的俄裔犹太移民;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制下,苏联不得不放松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促成了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这同美国在冷战

^① 1989年9月,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佩雷斯在访美时,向犹太人联合呼吁组织提交了一份吸收俄裔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需要的资金总额约为20亿美元,其中2/3将用于以色列。以色列还希望在3年内从世界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那里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3年内吸收10万俄裔犹太人。

背景下将非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扩张,维持全球霸权的国家利益完全相符。俄裔犹太移民问题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期牵制苏联、扶持以色列,从而维护其在中东地区战略利益的一张王牌。

六、结语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一度停滞的俄裔犹太移民活动重新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百万俄裔犹太人前赴后继,纷纷涌入以色列,开始了新的生活,最终形成了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他们摆脱了如同噩梦缠身的反犹主义浪潮,回归民族怀抱,借助历史祖国创造的有利条件,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的移民诉求同先辈们不尽相同,但同样为犹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同时,他们又面临着与先辈们不尽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融入历史的祖国、现代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影响着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

在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过程中,处于冷战中的苏联、以色列和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而采取的种种对策,对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冷战后期,苏联为摆脱内政外交上的困境,被迫实施战略退缩,迎合美以等国的需求,改变了长期执行的限制俄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政策,开启了20世纪最后十年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色列的大门。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历史祖国,视犹太人和犹太国家的生存和延续为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制定了积极的移民政策,采取了多种手段,先后吸纳了百万俄裔犹太人。而美国为维持其在全球和中东战略优势,在政治上对苏联施压,迫使其改变移民政策;在经济上对以色列支持,帮助其安置俄裔犹太移民,加快了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新一代俄裔犹太人的形成,使以色列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由于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清晰的历史上的民族共性,所以,作为民族的一份子,他们很快被以色列国家所接纳;但又因与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明显的现实上的文化差异,所以,作为外来的异乡人,他们很难完全融入以色列社会中。他们面临着移民所具有的共同任务——适应新的环境,在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过程中,既接受移居国——以色列固有文化的熏陶,同时保留寄居国——俄罗斯特定文化的印记。这个移民群体在以色列面临着两大任务:不仅求“生存”,即寻找和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更加求“归属”,即追求和构建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条件。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以色列这样的移民国家,生存与归属是相辅相成。因此,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回答“我/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即以什么样的身份立足于以色列的犹太社会中。构建身份认同,成为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定居以色列后的首要议题。这也将是我们的另一个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1]Репатриация в Израиль из СССР/СНГ 1948—2001 [R]. Израильский сай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http://www.il4u.org.il>.
- [2]肖宪. 苏联犹太人今昔 [J]. 以色列动态, 1991, №5.
- [3]梁中芳. 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政府和犹太移民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7.
- [4]刘竞、张士智、朱莉. 苏联中东关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5]宋全成. 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 [J]. 文史哲, 2003, №2.
- [6][美]泽夫·卡茨.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 [M]. 费孝通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7]尹崇敬. 中东问题 100 年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8]虞卫东. 当代以色列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9]路透社耶路撒冷电 [N]. 1990. 1. 15.
- [10]新华社突尼斯电 [N]. 1990. 7. 7.
- [11]耶路撒冷邮报 [N]. 1990. 3.
- [12]Щаранский Н.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M].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6г.

(责任编辑 陈 扬)